

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叙录（一）

李致忠

《离骚草木疏》四卷 宋吴仁杰撰 宋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罗田县庠刻本。

《离骚草木疏》四卷，宋吴仁杰撰。仁杰字斗南，一字南英，自号蝨隐。其先本洛阳人，后来居昆山，故又籍昆山人。仁杰有俊才，博洽经史，尝讲学朱子之门。登南宋孝宗淳熙五年（1178年）进士。历罗田县令，国子学录。仁杰以诗文鸣于一时，且敏而好古，长于稽考。所著《古周易》十二卷，《两汉刊误补遗》十卷，《褙袷绵蕞书》十卷，《周易图说》、《乐舞新书》、《庙制及言》、《郊祀赞说》、《监石论丙丁》各二卷；集《古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洪范辨图》、《陶渊明年谱》、《杜子美年谱》各一卷，皆行于世。《离骚草木疏》则又其一也。

吴仁杰生当南宋孝、光、宁宗之世，正值韩侂胄逐渐用事之时。韩侂胄字节夫，魏忠献王韩琦的曾孙。到其父韩诚，则因娶高宗宪圣慈烈皇后女弟为妻，官至宝宁军承宣使。侂胄非但以父仕入官，且以皇后为其姨母，先后历閤门祗候、宣赞舍人、带御器械。淳熙末年，又以汝州防御使知閤事。淳熙十六年（公元一一八九年）孝宗崩，光宗疾不能执丧，赵汝愚议策立宁宗、请宪圣吴太后垂帘。此事赖侂胄入白以成功。及宁宗立，韩侂胄恃

策立功高，赏赉不厚，而与赵汝愚相倾轧。面对韩侂胄日益专权的形势，朱熹亦尝建议对韩侂胄厚赐赏赉以疏之，因亦惹怨于韩侂胄。韩侂胄首讽赵党而劾去之。接着便设伪学之目，以网括赵汝愚、朱熹、彭龟年等门下知名之士数十人。吴仁杰尝讲学朱子之门，于思想上，与程朱理学自有一脉相通之处，亦属韩氏弹劾的对象之一。然于韩侂胄、赵汝愚互相倾轧之时，吴仁杰未敢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，故未被纠劾。然于奸佞弄势，忠良倾覆又极愤懑，于是乃祖述屈子《离骚》，譬诸草木，熏蕪既判，忠佞斯呈，以畅其流芳遗臭之旨。《离骚草木疏》吴仁杰自序称：“根茎华叶之相乱，名实之异同，悉本本元元，分别布居，次之于槩，会萃成书，区以别矣。”正道出吴氏作《离骚草木疏》之深旨。此书前三卷专疏芳草嘉木，则卷端下题均署“通直郎行国子录河南吴仁杰撰”衔名。但到第四卷《蕪草附录》，专疏蕪、葇、施等谗花媚草，则卷端下题竟付缺如，不署己名。前人推其深意，亦微示作者不与小人为伍。足见《离骚草木疏》之作，是作者借疏草木而别忠奸，完全是针对韩侂胄而来，亦属封建社会的党同伐异之作。

南朝梁人刘杳曾有《离骚草木疏》二卷，但早已亡佚。可资考镜者，仍是王逸的《楚辞章句》。吴仁杰少即喜读《离骚》，老亦时时手之，故洞悉《离骚》深旨。且悉《离骚》品题之草木多本《山海经》，故其《离骚草木疏》中引用之文，每以《山海经》为断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称其“征引宏富，考辨典核，实能补王逸训诂所未及。以视陆玑之疏《毛诗》，罗愿之翼《尔雅》，可以方轨并驾，争鹜后先，故博物者恒资焉。迹其赅洽，固亦考证之林也”。说明此书于《离骚》草木的考证、训释等方面，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。

庆元丁巳，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（1197），吴仁杰写了《离骚草木疏》后序。序称：“因按《尔雅》、《神农》书所载……，悉本本元元，分别部居，次之于槩，会萃成书，区以别矣”。说

明庆元三年即已成书。序文落款为通直郎行国子录河南吴仁杰书”，表明此书盖完成于国子录任上。此书卷尾又有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方灿写的后跋一通，称“比以《离骚草木疏》见属，刊于罗田县庠”。证明此书初刻是在南宋庆元六年。我们从前边吴仁杰的身世中，已知他曾登淳熙五年进士，历罗田县令、国子学录。县令一职，到宋代只存其名，事实上多以京朝官执行其职务，称为知某县事。吴仁杰身为国子学录，正是京官而知罗田县事，故有理由将自己的著作刊于罗田县学。

北图所藏此书，即庆元原刊。为每页十二行，每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此本传世极罕。清代乾隆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收有此书，但所据底本亦只是安徽巡府采进的影宋抄本。且在提要中称：“此本为影宋旧钞，末有庆元庚申方灿跋，又有校正姓氏三行，盖仁杰官国子学录时，属灿刊于罗田者。旧板散佚，流传颇罕。写本仅存，亦可谓艺林之珍笈矣”。足见乾隆时便以抄本为珍，而叹原本散佚罕传了。今以此段记载相印证，则与北图所藏此书之方灿跋文及校正姓氏一一相合，非但进一步证明北图此本即是庆元原刊，而且更加显示了它的孤罕价值。

北图所藏此本卷末有“宏治五年孟秋读过”识语一行，不知何人所记。但它说明此本在明朝曾为私人收藏。到清朝初年，此本流入徐乾学传是楼，又为徐氏藏书。今此书卷首仍钤有“弱侯”、“乾学”、“徐健庵”等印记可证。徐乾学字原一，号健庵，昆山人。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进士第二，官至刑部尚书。且学问博洽，家富藏书，其传是楼所藏甲于当代。

徐氏藏书散出后，此本又归汪士钟所得，汪士钟亦是清代藏书名家，书林巨擘。今此本仍钤有“汪印士钟”、“阆源父用”、“振勋汪印”等印记可证。汪氏藏书散出后，此本又为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所得。今仍有“宋存书室”、“杨印以增”、“绍和”、“协卿”、“东郡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杨绍和审定”等印鉴可证。海源阁藏书散逸后，此本展转收归北京图书馆。足见此本久

经名贤什袭，流传有绪。

此书非但宋本流传孤罕，其它传本亦不多见。现知北京图书馆还藏有明抄本一部，除宋本之外，此是该书的次早传本。乾隆至道光间，鲍廷博尝辑刻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其第七辑亦收有此书。清代方甘白还有个抄本传世，并录有鲍廷博校跋。此外如《龙威秘书》二集，《反约篇》，《榕圆丛书》丙集，《艺苑摛华》，《丛书集成》初编等丛书，也都收有此书，但算来亦不过几种。由于展转相袭，无一直接来自宋本，故一错皆错，无以是正。现知中华书局欲以北图所藏此本为底本，依原样影印出版，收入《古逸丛书》三编中。

《昆山杂咏》三卷 宋龚昱辑 宋开禧三年（1207年）昆山县斋刻本。

《昆山杂咏》三卷，宋龚昱辑。昱字立道，龚明之子。弘治《昆山县志》称其“有文学，安贫乐道，乡人称为龚山长。然名不达才，识者惜之。所居曰‘栖贤堂’，陆游、刘过皆为赋诗。”可见龚昱的人品、才学，均足称道。本书徐挺之后跋称：“栖间主人龚君昱，字立道，昆山佳仕也。讲学之暇，刻意于诗。袁所藏今昔名公之什，摠成此编。”综合这两段记载，我们大体可以推知龚氏的为人。盖淡于仕途科第，安贫乐道，不务功名。其于学问，则刻意于诗，有文学之才。又能讲学于县斋或书院，故有“龚山长”之称。

龚昱生在昆山，长在昆山，长期生活在昆山，故对故乡有深厚的乡土感情；且学问淹博，熟悉乡邦文献，谙于乡邦掌故；又刻意于诗，故时时留心于乡邦吟咏。“袁所藏今昔名公之什，摠成此编，”正道出《昆山杂咏》简略的成书过程。

“昆山虽处海隅，素号壮县，古迹今事接于见闻者不一。若人物习俗、文章论议，系治乱、关风教者，盖有志焉。此书既

缺，遂使一邑之事湮没无传。”（见本书范之柔序）昆山自古人文荟萃。古迹名胜、掌故旧闻、人物宦迹、风物习俗、文章论议，多有志乘记载。但此类志书一缺，则一邑之事便湮没无传。故“友人龚君立道哀次古今诗，分为三卷，目之曰《昆山杂咏》。又得百篇，号续编。尝取而读之，非徒记其吟咏而已……。立道刻意向学，其于暇日乃兼收并蓄，细大不遗，可以代图经之作矣。”（本书范之柔序）足见龚昱之辑集《昆山杂咏》，绝非徒记吟咏，而是可补志乘之缺，代图经之作矣。这不但是当时人对此书的认识，盖亦是龚氏辑集此书之深旨也。故范之柔赞而予见说：“继自今或有所得，当陆续书之，亦可使后人之祖其意而有所述也。”

果然，到了明朝嘉靖年间，便有王理之祖其意，起而继辑《昆山杂咏》六卷。且称：“龚立道氏尝集唐宋诸名家诗若干什，曰《昆山杂咏》，其友范清宪公序之详矣。王秋堂隐君复集元人及我明人之作而附益焉。”（见北图所藏明嘉靖二十年孟绍曾刻本王理之《昆山杂咏》方鹏序）。时隔不到三十年，即隆庆四年，又有俞允文起而重辑《昆山杂咏》二十八卷。且称：“龚立道所纂辑是书，仅见宋刻残本，罕有行世者。嘉靖初，王君理之复集近代诗百篇，以附末卷。太常方公为之序引其端，先大父西园公已加侵板。值寇乱板毁，而王君所集兼有未该，乃重谋诸俞仲蔚氏，更为搜采唐、宋、元以来诸名贤集，复得诗数百篇，以类编次，勒成二十八卷。”（见明隆庆四年孟绍曾刻俞允文《昆山杂咏》跋）足见自龚立道开辑《昆山杂咏》之先河，则有王理之、俞允文踵辑《昆山杂咏》于其后。所辑诗作由远而近，由少而多，蔚为大观。非但记其吟咏，富一地之艺文，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加以研究，则实为一部诗歌体裁的昆山图经巨帙，足资考镜。

龚氏《昆山杂咏》，首录张祐咏慧聚寺诗，终录陈世守咏枇杷绿桔，分为上中下三卷。据前引范之柔序称，三卷之外，尚

有续编百篇，勒为一卷附于卷末。明代隆庆时俞允文亦辑有《昆山杂咏》，其自序亦称“龚立道则专录历代名贤诗歌，为《杂咏》三卷，《续编》一卷，以为一邑之书。而《续编》亡佚，不可复得。”足证龚氏所辑《昆山杂咏》在三卷正编之外，确有《续编》一卷，收诗百篇。所以此书全帙，当是《昆山杂咏》三卷《续编》一卷。且于南宋开禧三年同时付梓。今传世者仅有正编三卷，而续编佚之久矣。前曾征引俞允文《昆山杂昆》之孟绍曾跋尾，亦称“龚立道所纂辑是书，仅见宋刻残本，罕有行世者。”孟氏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残缺的究竟是什么，但证以同书俞允文自序，显然亦指的是残缺了《续编》部分，而实存仅是正编三卷。足见宋本此书早在明代嘉隆以前就已残缺不全了。而仅存的三卷正编亦是传世孤罕了。

龚昱所辑《昆山杂咏》，最初刊于宋开禧三年，此本今藏北京图书馆。此本前有嘉定改元朝散郎监察御史范之柔序文，后有开禧丁卯中秋仪真徐挺之识语。范之柔字叔刚，范仲淹的五世孙，将作簿范纯佑的曾孙，赠中奉大夫范公武之子。自其父辈徙居昆山。范之柔登乾道八年（1172年）进士，嘉定初元拜监察御史。今此书范氏序文落款为“嘉定改元十二月初吉朝散郎监察御史范之柔序”衔名与时间正相符合。故乡名宦，为故乡人所辑吟咏故乡之诗作撰序，情理亦洽。后跋为仪真徐挺之所作。徐挺之本仪真人，来知昆山。其前任为潘文叔。故其跋文称“龚氏摠成此编，以示交承金华潘文叔。文叔迫去，不克广其传。挺之试邑，刊真县斋。不惟嘉立道之好尚抒，以全文叔之志云。”这就明确地证明，此书于宋开禧三年由徐挺之主持刊于昆山县斋。今北图所藏此本，序跋俱存，且字体端庄，行格疏朗，款式大方，麻纸印造，墨色纯正，完全是宋刻风貌，系开禧原刊无疑。书中构、慎、敦字皆注庙讳。如无为子邾正夫《寄妙观大师并呈乡中诸亲旧》诗中，“窃闻构新殿，东畔过廊屋。凡事在臻牢，慎勿尚遄速。椽角贵稠直，楣拱要敦笃”中的“构、慎、敦”三字，

就都填注庙讳。说明其于高、孝、光三帝嫌名全行回避，亦是宋刊之佐证。

此本传世极罕，明朝嘉隆间已有人为之感叹。明清以降，亦不见有单刻、丛刊流布此书。唯民国初年，赵诒琛辑刻《峭帆楼丛书》收有此书，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。北图所藏此书宋刊本，曾为清代汪士钟家藏书，迄今有“三十五峰园主人”、“三十五峰园主人所藏”、“汪印士钟”、“汪印振勋”等印记可证。汪氏藏书散出后，此本为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得。铁琴铜剑楼前身藏书处，尝名恬裕斋，故此书又钤有“恬裕斋”、“铁琴铜剑楼”等印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，铁琴铜剑楼旧藏悉数移赠北京图书馆，此本亦随之入藏于北图。中华书局欲将此本依原样影印出版，收入《古逸丛书》三编中。

《梅花字字香》二卷 元郭豫亨集 元至大刻本〔杨绍和跋〕。

《梅花字字香》前集一卷后集一卷，元郭豫亨集。郭豫亨，自号梅岩野人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称其里籍未详。此说虽然未必可信，但其生卒爵里、行实际遇、政治态度、文学主张以及著述状况等，又确难稽考。

元末明初的王逢，著有《梧溪集》。该集卷五收有王氏俭德堂怀寄诗二十二首。其中一首称：“彭郭上清班，相望高世间。木龕双石壁，棕屨万云山。轩冕泥涂底，诗书桎梏间。乡园数形梦，欲借羽车还。”诗前还有一小序，序称：“彭素云，中州人。郭梅岩，西江人。并学全真，有道行。”我们从这首诗和小序，可以知道郭豫亨是西江人，尝与中州人彭素云同崇上清，并学全真，名高当世，为道家者流。而且以诗书为乐，棕屨云游，放浪不羁，超然世外。

本书自序亦称：“余爱梅，自号梅岩野人。”并说：“平生与梅同一冷淡，越历冰雪，笑傲山林。咏春风，醉明月，心清香

妙，气合神交，必知梅妖我耶，我妖梅耶！”这更进一步透露了郭氏借梅自重，拔群不俗的孤高性格。

爱梅咏梅，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墨客，特别是那些怀才不遇、失意遭毁而又愤世疾俗的文人墨客，常以梅为吟咏描绘的主题。但梅之傲岸高节被这些文人所认识并引以自喻，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。屈原放逐而赋《离骚》，尝遍搦香草，寄寓其忠贞不渝的爱国深情，和洁身自好、愤世疾俗的高风亮节。然独不及梅花。六朝及唐，于梅花渐有赋咏，亦不过偶然寄意，视之与诸花并无不同。然自南朝梁何水部以“枝横花绕”擅美于前，北宋林和靖则更以“暗香疏影”踵华于后，于是作家蜂起，别立品题。南宋以降，蔚为大观，咏梅遂成诗家一大公案。一时文人雅士、江湖诗人，无论爱梅与否，无不借梅以自重。此倡彼和、此绘彼咏，赓续不休。所咏之内容，从点点梅花，到横枝老干，从累累梅实，到黄牙绿叶；从冬梅傲雪，到夏梅斗日，几乎吟咏殆尽。

明代文坛巨擘、竟陵派大师钟惺，有一篇著名的《夏梅说》。他在这篇短论中说：“冬春冰雪，繁花粲粲，雅俗争赴，此其极热时也。三四五月，累累其实，和风甘雨之所加，而梅冷矣。花实俱往，时维朱夏，叶干相守，与烈日争，而梅之冷极矣。”还说：“张谓官舍早梅诗所咏者，花之终，实之始也。咏梅而及于实，斯已难矣，况叶乎！至于叶，而过时久矣。廷尉董崇相官南都，在告有夏梅诗，始及于叶。何者？舍叶而无为夏梅也。”钟惺这篇短论，意在讥讽那些趋炎附势的钻营小人，但于历来咏梅之人，咏梅之意，咏梅之作，也是一个深刻的总结与概括。

郭豫亨《梅花字字香》，是采撷历来咏梅诗句而成编。郭氏于前人咏梅诗作中反复玩味，别出新意。一反前人咏梅歌诗或彼此唱和之常态，而采摘古人咏梅之佳句，经过意义的推敲，韵律的协调，再连贯成诗。且能句锻意炼，璧合珠联，属对工巧。其用心之良苦，刻意之新奇，诚为咏梅诗又辟一新径。别开生面，堪称咏梅诗作之别裁。

此书成于至大辛亥，其自序写于是年腊月八日，已是岁末。其刊行是否亦在是年，不敢断言。钱遵王直称此本刊于至大辛亥，虽然未必妥当，但就一般规律而言，其刊刻亦不会去作序之年甚远。故称为至大刻本，亦无不可。元初刻书，往往带有宋刻的流风余韵。此本行格疏朗，字画古劲，亦如梅之老干虬枝，亚影疏窗，殊可爱玩，实为元刊中之上乘。

清初钱遵王藏有此本，后归内府，世极罕见。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，钤有“安乐堂藏书记”、“明善堂览书画印记”等印鉴。安乐堂印记，当是清初宗室允祥的印鉴。允祥是清圣祖玄烨的第二十二子，清世宗胤禛雍正时封为怡亲王。杨绍和跋称：“此本为怡邸旧物，即至大原刊。”怡邸盖即指怡府允祥。“明善堂览书画印记”，盖为清宗室奕绘的藏书印鉴。奕绘是清高宗弘曆的曾孙，自号太素道人，笃好风雅，继承的盖是怡邸旧物。故此本於清朝长期为内府珍秘。后逸出内府，为聊城杨氏海源阁所得，今仍钤有“海源阁藏书”、“杨绍和”、“东郡宋存书室珍藏”、“颺卿珍赏”等印鉴可证。海源阁藏书散出后，此本收归北京图书馆珍藏。

此本传世极罕，堪称海内外孤本。清咸丰中，仁和胡珽得五砚楼袁廷枬抄本，刻入其《琳琅秘室丛书》中。胡氏并作《校讹》一卷，附录其后。然正如杨绍和跋文所指斥者，“胡刻舛误颇多。如每诗标原作姓名于后，皆随所集之序次，故一诗之中，一人集至数句，亦必重书。其偶未注出者，则以空格或墨钉间之，而胡刻一概连写，遂令序次混淆，诗与人均牴牾不合，且莫辨漏注者为何句。非见此原刊，几无从是正矣。”故到光绪时重刊《琳琅秘室丛书》，只好由董金鉴又作《续校讹》一卷，用以订正胡刻之误。以后《丛书集成》初编所收之《梅花字字香》，便是光绪时的《琳琅秘室丛书》本。

除此之外，清康熙时顾嗣立辑刻《元诗选》，其中第二集的己集，亦收有郭豫亨的《梅花字字香》，不过只录了其中的十

二首，并非全帙。更后的《元诗纪事》，则是照抄《元诗选》。到乾隆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亦收有此书。所据底本，乃浙江鲍士恭家藏本。收诗亦为九十八首，与元刊本同，较为接近元槧面貌。不过删掉了元刊自序，显得美中不足。此外还有一些抄本流传，但都未必源于至大原刊，故文字讹误颇多，均赖元刊以是正。

中华书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的规划，欲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元刊此书依原样影印出版，辑入《古逸丛书》三编中。

《梅花百咏》一卷 元韦珪撰 元至正刻本〔黄丕烈跋并题诗〕

《梅花百咏》一卷，元韦珪撰。韦珪字德珪，自号梅雪。山阴人。其生卒行状不详。陈衍《元诗纪事》卷二十四，徵引《西湖竹枝集》，称“韦珪早年以诗鸣其乡，有《梅花百咏》梓行于书坊。其网罗古今诗人之学而日进，于近古者未已也。”透露出韦珪早年便以工诗而名世。这当是他后来撰写《梅花百咏》的基础。本书杨维禎序称：“德珪名珪，梅雪，其自号也。”干文传序称：“德珪尝颜其读书之窝曰梅雪，则其嗜吟清苦之志，固可见已。”自序落款亦称“山阴韦珪梅雪窝书。”透露出他不但以梅雪自号，而且颜其读书处曰梅雪窝。足见其爱梅成癖，借梅自重，孤高自许的傲岸性格。这大概是他撰写《梅花百咏》的思想基础。

《梅花百咏》始作于至正二年（一三四二年）冬十一月。其年，李仲山按治姑苏。李氏公余之暇，常与三五好友商确古今，麀麀忘倦，因命韦珪赋咏梅诗。珪受命吟梅，初仅得二十六首。后又摭拾见闻，演为百首，遂成《梅花百咏》。到至正五年（一三四五年）十一月，韦珪携稿倩杨维禎作序，并录副于西湖之上，说明此时《百咏》稿已全部完成。然到岁在强圉大渊献，即至正丁亥（至正七年，一三四七年），又倩干文传作序，说明诗稿尚在推敲润色中，还未版行于世。

这里有个问题，附带说几句，即关于干文传的生卒年问题。梁廷灿《历史名人生卒年表》及姜亮夫先生的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，都说干文传生于南宋咸淳二年（一二六六年），卒于元至正三年（一三四三年）。这就有了疑问了。文传于至正三年已死，乃于至正七年为韦氏《梅花百咏》作序，岂非咄咄怪事！推其原因，盖是两表之误。干文传字寿道，平江人。其祖父之先世尝以武弁入官，其祖父以为不够雅尚，力教其子雷龙即文传之父习文。雷龙锐意从文，两举进士。宋亡，未及仕。遂以“文传”名其子，期以文易武（详见《元史》干文传本传）。这说明干文传出生恐怕已经入元，而不是宋咸淳二年。《元史·干文传传》还说“至正三年，召赴阙承诏预修《宋史》。书成，赏赉优渥，仍有旨四品以下各尽一官，擢文传集贤待制。亡何，以嘉议大夫，礼部尚书致仕。卒，年七十八。”这里文意是十分清楚的，绝无至正三年即是干文传卒年的含意。两《表》盖是先误解至正三年即是干文传卒年，又知其活了七十八岁，然后由此上推七十八个年头，于是又得出其生于咸淳二年的结论。现借元刊韦氏《梅花百咏》干文传作序之年，使两表可以得到是正，即干文传至早也要在元至正七年以后才死。清康熙《昆山县志》卷十四称干文传“至正三年擢集贤待制，朝请大夫，俾居《宋史》前局。史成，锡赉优渥，遂上引年之请，以礼部尚书致士。优游里闾，十年而卒。”证明干文传卒于至正十年（一二五〇年）。如以活七十八岁计，则其生年当是一二七三年，即元至元十年，而不是咸淳二年。

这是一段插曲，与本题无甚相干。现在回过头来，仍说《梅花百咏》之成书。干文传一序，说明此书在至正七年长至日还未正式刊行。其因盖缘韦珪以梅花未入楚辞为古今之通恨，遂作《补骚》一章，附于书后。且又倩天台胡世佐撰序一篇。所以此书之最后成书并版行于世，至早不会早于至正七年。

此本为每半页九行，行十六字，线黑口，左右双边。看去行格疏朗，字体秀劲，实属元刊中之上乘。前边曾引用过《元诗纪

事》，说韦珪“有《梅花百咏》梓行于书坊”。若此话可以置信，则此本于元代坊刻中更属佼佼者。

此书传世绝少，元刻尤稀。《二十五史补编》中的《补元史艺文志》和《补辽金元三史艺文志》，均不见著录此书。元人顾瑛的《草堂雅集》亦未收录片言只句。唯明朝嘉靖时的国子监生王化醇，收入《梅花百咏》中。化醇字和甫，号应峰，无锡人，平生好撷拾前人咏物诗，辑有《百花鼓吹》和《梅花鼓吹》，凡三十八种。但世人很少知道他还辑刻有《梅花百咏》三卷，其中中收元人冯子振《冯海粟梅花百咏》一卷；元释明本《中峰禅师梅花百咏七言绝句》一卷；韦珪《韦德珪梅花百咏》一卷。这是元刊韦氏《梅花百咏》之外，仅知道的另一刻本。此本今亦珍藏于北京图书馆。明朝以降，直到清康熙时顾嗣立的《元诗选》、乾隆时的《四库全书》，乃至最晚的《元诗纪事》，于韦氏《梅花百咏》均付缺如。唯阮元留心典籍，于《四库全书》未收之书，颇注意旁收博采。并仿四库进呈例，每采一书，先撰提要一篇，然后进呈乙览。故其后人阮福辑刻的《擘经室外集》中，便收有阮元为进呈韦氏《梅花百咏》撰写的提要。此后阮元又辑集《宛委别藏》丛书，其中收的韦氏《梅花百咏》，便是影元抄本，说明阮氏见过元刊本。

元刊本传世极罕，堪称天壤间传世孤本。清以前传世情况很难详考，乾嘉以降，此本流传有自。先是为杭人姚虎臣珍藏，后因陈仲鱼作笈，转归黄丕烈珍藏。黄丕烈是清朝乾嘉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和鉴赏家。尝获藏宋本《忘忧清乐集》，即现存传世最早的围棋古谱。后又因陈仲鱼之力，于北京琉璃厂得宋刻《梅花喜神谱》，遂成宋刻二谱之合璧。陈仲鱼与黄堯圃，两人以文会友，意气契合。深知黄氏珍爱古书，尤爱古书之有涉于梅者，故又竭力为黄氏搜求元刊韦氏《梅花百咏》。大约在嘉庆二十二三年，陈氏果于杭人姚虎臣处购到此书，转给了黄丕烈，使黄氏珍藏又成双梅之合璧。迄今有“复翁”、“黄印丕烈”等藏书印鉴可证。

黄氏藏书散出后，此本为汪士钟所得，今有“汪士钟”藏印可证。汪书散出后，此本又为估人所得。咸丰元年，转归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珍藏，迄今有“杨印以曾”、“彦合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东郡杨氏宋存书室”等印鉴可证。杨氏藏书散出后，一部分展转到了天津，此本又为天津周叔弢先生所得，今有“周暹”一印可证。周先生是当代著名的藏书家。新中国建立之初，周先生出于爱国热忱，为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，慨然将自己多年苦心搜求的一批善本书，转赠给北京图书馆，元刊韦氏《梅花百咏》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现在，中华书局根据古籍整理出版规划，欲将北京图书馆所藏元至正刊本韦氏《梅花百咏》依原样影印出版，收入《古逸丛书》三编中。

周叔弢先生与宋板周昙《咏史诗》

爱国主义者、当代藏书家、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周叔弢先生，近年曾为天津古籍书店景印宋板周昙《咏史诗》作跋。略谓：“五十年前尝遇宋板《寒山子诗》及此宋板孤本，（闽本，黄麻纸，框高一九·五厘米，宽一二·五厘米，每半页十二行，行二十字）因限于当时财力，凡置前者，而不克一并置此，竟失之交臂。迨见十年内乱中书店自废纸堆里拯出之籍，即当年失之交臂者，缘此孤本尚在人间，并以将付景印化身千万而欣喜万分”。及至新籍印毕发行，弢翁对其跋将有以修订，遂就较为熟悉者新置之籍挥硃毫而校勘之。津门古籍装池名手杨富村同志持彼我之卷往谒，亦得其硃毫校。乃瞻遗迹，萦念切切，爰赋七律一章，以申敬忱。

周昙詠史有诗篇，
交臂失之遐往日，
刊行景印公跋殿，
覆勘新编些许卷，

天壤孤籍赵宋鏤，
探筐拾获迩来年。
遮嬗源流说度先，
卒得硃校任凭瞻。

·程光·